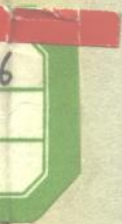


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資料

第二輯

內部读物



人道主义、人性論研究資料

第二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Z1120/31
内部读物

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

第二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3017·108

1964年9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313千字

印张13 $\frac{14}{16}$

印数1—5,000册

定价(10) 2.20元

《人道主义、人性論研究資料》

出版說明

在同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义意識形態的鬥爭中，人道主义是一个值得重視和研究的問題。

“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是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資產階級先进的思想家，为了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思想的束縛，反对封建統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和个性解放而提出的。人道主义在資產階級的初兴和上升时期，代表着进步的傾向，起过积极的作用。到了資本主义的沒落时期，資產階級的人道主义、人性論就成为資產階級在思想領域內宣揚階級調和、反对階級鬥爭，反对无產階級革命的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無論在資本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人道主义都有廣泛的討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以及資本主义国家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发表了許多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有些文章中把人道主义看作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理想，认为“人道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人道主义永远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最高标准”；“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最高形式”；等等。这些論点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沒有絲毫共同之处。現代修正主义者极力鼓吹超階級的人道主义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階級鬥爭的学說，在思想上和資產階級合流。在当代資產階級的思想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几个重要的哲学流派如新托馬斯主义、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它們的代表人物都宣揚各自的

人道主义观点。新托馬斯主义者认为“人是上帝的合作者”，提倡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个人存在先于客观存在），所谓存在是意志或行动主体的个人存在，而人不受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的制约，有“选择”自己命运的“绝对自由”。他们宣扬人生悲观的人道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总是和人敌对的。人格主义者认为需要改造的只是人的精神状态或“人格”，而不是客观世界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宣扬所谓“精神自我修养”的人道主义。现在欧洲、美洲许多国家，如美、英、法、西德、比利时、挪威，还有亚洲的印度等国，都成立有人道主义的专门组织。这些组织又共同建立了“国际人道主义和伦理学协会”，他们自称为“人道主义的拥护者”，大力提倡开展人道主义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广泛的社会人士（包括共产党员）。

为了研究当代各种人道主义的论说，批判修正主义者关于人道主义的各种观点，需要提供大量的材料。为此，我们编辑了这部《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资料》的文章采自外国的报刊和书籍。其中有些早经译出，见于国内的有关学术资料，有些则是新近译出的。现在分辑出版，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由于国内材料不足和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搜集的文章还是很不完备的，重要的材料一定会有遗漏。希望读者随时提出意见，给予指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4年5月

第二輯說明

本輯所收都是东欧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学者的作品，共十六篇文章，約三十万字。大部分文章是从哲学和一般社会、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論述人道主义的；只有匈牙利卢卡奇的三篇文章偏重論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波兰沙夫一文是1961年9月在日内瓦国际討論会上討論“幸福的条件”問題时，作者所作的专题报告。当时在討論会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作报告的，只有沙夫一人。沙夫是波兰統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員。属于羅馬尼亚的，本輯只收了羅馬尼亚科学院在1960年1月举行的有关討論会上的一部分发言摘要，其中包括若干学者对 人道主义所下的定义、对 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含义所作的分析。

由于資料的限制，我們对大部分作者的介紹(各文末尾)都是十分簡單的，对个别作者甚至沒有能够作出介紹。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4年5月

目 录

个人幸福的社会条件	[波兰] A.沙夫 (3)
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质”	[波兰] M.弗里茨汉 (21)
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的理想	[波兰] M.弗里茨汉 (56)
費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馬克思的人	
道主义的异同	[波兰] M.弗里茨汉 (104)
关于青年馬克思的哲学遗产	
爭論	[波兰] M.弗里茨汉 (121)
关于异化問題	[波兰] П.巴契柯 (140)
新托馬斯派人格觀的反动性	[民主德国] R.米勒尔 (174)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战斗的	
人道主义	[民主德国] G.門得、E.艾采尔 (195)
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的哲学”	[捷] A.柯尔曼 (215)
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捷] A.安格斯特 (225)
人道主义与我們的时代	罗马尼亚科学院討論会发言摘要 (263)
論伦理学范畴的幸福觀	[保] B.臧科夫 (301)
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在解释	
个性問題上的对立	[匈] H.蒂波尔 (324)
历史小說中新人道主义发展的远景	[匈] G.卢卡奇 (358)
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議文学	
的一般特征	[匈] G.卢卡奇 (380)
古典人道主义的插曲	[匈] G.卢卡奇 (418)

个人幸福的社会条件

〔波兰〕A.沙夫

譯者按：日內瓦国际討論会于1961年9月6—16日，举行了第十六届討論会，主题为“幸福的条件”問題。参加討論的有来自許多国家、代表各种流派的人士五十三人。会上有五个人作了专题报告：（1）季埃格莱（Henri de Ziegler，瑞士人）：“幸福的光景及其源泉”；（2）杜巴勒神父（Le R. P. Dominique Dubale，法国人）：“幸福的哲学条件”；（3）拉加歇（Danil Lagache，法国人）：“从心理分析观点看幸福”；（4）沙夫（Adam Schaff，波兰人）：“个人幸福的社会条件”；（5）朱維納尔（Bertrand de Juvenel，法国人）：“理想世界”。此外，日內瓦市教育局局长波雷耳（Alfred Borel）和日內瓦国际討論会委员会主席迈尔（Louis Maire）也作了演說。

围绕各个专题报告，又举行了七次各有一个中心問題的討論会：（1）“幸福和基督教的价值”；（2）“有理性的人”；（3）“心理分析观点”；（4）“社会主义倫理学中的幸福問題”；（5）“现实的幸福和理想的幸福”；（6）“面对着幸福的青年一代”；（7）“为人服务的经济学家”。最后举行了总结討論会。

在討論会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作报告的，只有沙夫一人。許多资产階級学者对沙夫的专题报告提出了质詢，沙夫又作了答辯。

討論会的全部专题报告、演說和討論记录，由該会編成一集，题为《幸福的条件》，由瑞士巴科尼尔出版社出版（法文）。本文是从这本汇编中譯出的。

什么是幸福？关于这个問題，每一个人都觉得可以給自己作

出一个答案，但是要作出一个彼此共通的、考虑成熟的答复，却是极其困难的。此外，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写文章来讨论，不但很困难，而且从科学的观点看来，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从它对人类所提出的意义说来，这个问题虽然很吸引人，但由于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有把探讨者引入迷途和绝境的危险。

所以，最好首先把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达到这种分析所通过的角度，好好规定一下。

接触幸福问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观点可能彼此不同。可以从正面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规定一个幸福的个人的主观状态所应有的种种因素，或者规定享有哪一些利益的总和才可以算是幸福。也可以从反面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寻找那些与个人幸福相对立的因素以及消除这些因素的方法。这两种观点虽然有其共同之点，但差别是很大的。至于对一个特定的现象的种种起码条件的分析，那是另一回事，而分析这种现象所应有的充分条件，又是另一回事。摆脱那些一般地妨害达到个人幸福境界的因素，那是起码的条件，但这对于保证他的实际幸福而言，是不够的。实际上，还有着由这个个人的人格、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历史和社会条件等等所决定的很多别的条件。幸福的境界是同在特定条件中的特定个人紧密联系的。因此，使某一个人成为幸福的东西，使他成为幸福的理由，对另一个人说来，很可能成为一种绝对相反的状态的原因；这里我们还不想到时间因素、要求的多样性以及人们对社会条件的变革所采取的态度等等。

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研究幸福问题，想列举使一个人成为幸福的种种因素，那末我们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不会得到答案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越是谈论一个幸福的人的境界（和他的情绪状态），越是想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形式上似乎客观的答案，越是用一种

把我們自己也弄得糊里糊塗的語言本質來談論那些足以表示幸福的利益，那末我們一定會陷入一個如此滲透着主觀因素的領域，而我們想給這個問題找到一個普遍有效的答案的嘗試注定會破產。這不僅僅指這樣一種謬論而言，即認為某人要感到幸福，必須本來是不幸的。個人的心理過程是太複雜了，決不是人們可以把它納入一個公式和圖式之內的。因此，對於個人幸福所必須的條件的研究，不可能解決問題，也不會對“什麼是幸福？”或“人在什麼時候才是幸福的？”這個問題帶來答案。但是，據我看來，更有意思的還是——尤其從社會行動的角度來看，也會有效果——研究一下人的幸福所起碼必須的條件；這比研究表面上更為全面的那個幸福所必須的充分條件問題，更恰當些。

我並不是說後一個問題不值得研究和討論，如果我們清楚估計到這個問題所包含的主觀主義方面，而且如果能夠避免由這個提得不恰當的問題所引起的神秘化，那末，關於幸福所必須的充分條件的研究，也會對於對個人的認識提供一些有益的因素，而且會使人相信；按照一切人的“完全的幸福”這個公式所進行的研究，是徒勞無功的。誠然，一個否定的答案至少不能算是一個答案，指出研究的徒勞無功，至少也不能算是一個研究的成果。但是，當我們從正面去研究幸福問題時，我們一般得到的是反面的結果。反之，當我們從反面去進行研究時，卻一般得到正面的結果。首先在人類的活動領域，在為人類幸福而鬥爭的領域，是這樣的。我就是根據這個理由，所以覺得從這一方面加以考察，更有意思，而且更容易得出結果。

這裡就牽涉到關於人的幸福的社會的條件的研究。所謂社會的，是在這個詞的兩種意義上：第一是把人的幸福和這種幸福的條件不是從特定的個人方面去理解，而是從人民群眾的方面去理解；

第二是一种社会的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种社会的行动的目的在于无论如何要消除那些对人的美好生活的障碍物，而且至少在群众的水平上，保证人们的幸福生活；即使并不保险，至少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主张大家集中来讨论人的幸福的社会条件这个问题。此外还因为这个问题虽然是理论性的，却并不抽象。它深入社会生活的实际，直到行动的领域。因为这个幸福问题的特征正在于仅仅采取理论家的态度是不可能解决的。应当有一种行动的态度，应当采取一种立场。这个问题的特点和重要性，不正是在这里么？

人们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一般总是从对这个问题下定义开始。否则，用语本身就会引起混乱和相反的意义。谈到“幸福”这个字的时候，特别是如此。但是，我承认我将违反这个习惯。理由如下：如果我们纠缠在我们所考虑的这个字的定义里，那就不免会使我们脱离所研究的方向，而且使我们陷入关于这个复杂的字的繁琐的考察中。由于定义是同一定的观点相联系的，我们的考察必然会具有一种历史的性质。既然我们的意图不在于此，这也不是我们的对象，因此最好是放弃下定义的工作。无论人们在一般直觉的意义上把“幸福”这个字说成这样那样的意思，不管字典上对这个字有这样那样的定义，对我们的要求说来，说幸福就是个人在任何一种原因之下所感到的一种心满意足的状态的持续，这就够了。不管每个人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已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管还可以加上别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开头说过的，每个人都明白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是幸福的，但却不能正确地给他所表示的意思下定义——但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尝试，考虑人的幸福的社会条件以及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行动。

* * *

每个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觉得幸福和不幸。但是，虽然幸福感和不幸感有其主观的方面，虽然每个个人的反映不同，却还有一些为一切人所共有的因素。任何人，当只是属于他所有的一个东西被剥夺了的时候，就不会是幸福的。但也有这样一些事物，它们是人人都想望的；对它们的占有是对人人都有重要意义的。这些事物如被剥夺，那末所有正常的个人——除了那些病态的人——都成为不幸了。幸福问题上的这些消极因素的领域，对全人类说来都是共同的，这同幸福的个人性和主观性毫无矛盾之处。这样，我们就在这个暧昧的问题中接触到某种固定的和具体的东西；这种东西，由于它的普遍性，是更易感觉到的，而且更容易成为人的行动的对象。这一类问题的重要性，主要就是在这里。

一个受饥饿和贫困的痛苦的人，一个连那些由一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所决定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物质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幸福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中国故事，讲到某个皇帝想找到一个幸运儿而占有他的衬衣。这个幸运儿终于被找到了，然而皇帝发现这人是沒有衬衣的。这个故事虽然很有趣，但从它的内在的含义说来，却不能不说是虚伪的。这个故事，显然是那些身上穿着又美又好的衬衣的人们虚构出来，而用以安慰那些被剥夺了衬衣的人们的。饥饿和贫困不能使人感到幸福，这是确定无疑的。恰恰相反，饥饿和贫困是造成不幸的深刻而真正的原因，而且一般总会激起人们的反抗和斗争。为了争取幸福的权利而斗争，为了消除使人得不到幸福的障碍而斗争——这当然不等于说，仅仅消除了这些不幸的条件，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幸福。

然而，使人不幸的重大原因并不只限于饥饿和贫困。同样的原因还有剥夺自由、民族压迫、经济剥削、种族歧视以及其他使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失去同其他的人的平等地位的类似情况。在所有

这种种情况之下，問題在于人們被剝夺了某些对象或关系。在任何情况下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被剝夺，尽管比起生活所必須的物质資料的缺乏来，好像是另一回事，但人們也是同样强烈地、痛苦地感觉到的。为自由权利的斗争，作为一种刺激反抗的强大力量，并不亚于飢餓和貧困。这也是一种为了个人幸福的权利的斗争。因为在这里也关系着这个个人的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个条件确实并不足以使个人成为幸福，但缺少了这个条件，却就足以使他成为不幸。

显然，还有另外一些条件的缺乏也会使个人成为不幸。例如，一种不被接受的爱情，一种得不到滿足的权力欲，或者得不到別人的尊敬等等。这类情况是如此之多，只要到社会現象中去找，就不胜枚举。不过，在第一类例子和第二类例子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區別。問題在于，第一类例子所表示的，是个人幸福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碰到的障碍，而第二类例子所表示的則是一定的个人的心理特征以及他在同另一个人的私人关系中（如在恋愛的情况中）所碰到的障碍。因此，在第一类情况下，有可能談到社会的干涉，因为不正义的社会关系的改造——这种改造是可以由社会地組織起来的人們来完成的——会消除个人的痛苦根源。至于第二类的情况，則社会是无法干涉的。或者至少是不能直接进行干涉的（在对个人心理活动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条件改变以后，間接的干涉是可能的，但这种干涉一般是不自觉的，是自发的）。从人們为了个人幸福而改善它的社会条件和前提的自觉行动这个观点看来，显然第一类情况的領域是特別有意义的。这个領域，几世紀以来，在所有的进步的社会运动的綱領中，都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在各种各样的提法和形式之下出現着，而这些社会运动的实质，都是为了爭取个人幸福的最有利的条件的斗争。

換句話說，問題在於進行鬥爭，而為合乎人道的人格的發展創造最有利的條件。正是因為這樣，所以那些把創造個人幸福的條件作為他們的社会行動的目的的人們是人道主義者——在這個字的最完美的意義上。這樣，我們在估計各種社会運動及其綱領的價值，估計各類人道主義的時候，就有了一個標準。

*

*

*

一切社会運動都談到人的幸福，並把這個宗旨載入綱領。不這樣可不可以呢？能不能以別的任何宗旨為根據呢？還應當指出：就連那種明顯的反人道主義，那些主張滅絕人種和仇恨人類的如希特勒主義或殖民主義以及各種面貌的種族主義，也同樣使用着為人的幸福而鬥爭的空話。不過我們應當明白它們所講的人是什麼以及它們在人這個範疇里排斥了什麼。希特勒的“超人”也好，我們時代的種族主義者也好，都認為凡是不屬於他們的一伙的個人都不在人的範疇之列，這樣一來，他們的任何滅絕人性和發泄兽性的行為都可以得到原諒了。

對於這種觀點，他們還可以在許多光輝的先驅者身上找到辯護，譬如某些古代的人道主義者就是把奴隸只看作是會說話的工具的。這一點，對於評價各種人道主義的歷史性——和相對性——的討論是有用處的。

同樣重要而有意义的問題是：在各種人道主義彼此相衝突的地方所表現出的真正的選擇的矛盾，與此相聯系的還有關於個人幸福以及怎樣達到幸福的各種各樣的觀點。在這方面，我們時代的主要矛盾，是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義和其他各種人道主義之間的对立相聯系的；唯心主義的人道主義以它們的哲學內容，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以它們的首創者的思想，都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義進行鬥爭。

在这里，我只限于指出属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个人幸福观的一些基本因素。

至少有两个因素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古今其他种种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第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把个人看作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阶级关系的产物；这些关系决定了个人的立场和行为。另一些观点，则认为个人的形成，或者是由于他的善良愿望，或者是由于同社会无关的某个至上的存在者的意志；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形成个人的乃是人所创造的种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同时又把人创造成社会的人。关于个人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之间的对立，主要就在这里。但是，作为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出发点的个人观产生出许多后文，从其哲学性质说来，必然要联系到人的问题作另外的研究。也必然要联系到个人幸福的问题。因为，如果人道主义是关于个人的理论，那末它也是关于这个个人的幸福的理论。事实上，考虑这种幸福和考察实现这种幸福的可能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个人作如何的考虑和理解。

其次，而且我们认为最要紧的一点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联系作为其特征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它把自己的首要的任务和目的，规定为：为了达到它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进行战斗。这一点特别同个人幸福问题以及同研究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关。

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它的人道主义，而这种人道主义的实质是它的个人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它的哲学，它的政治经济学，它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都正是服从这个问题的。这一切都是为唯一的实践目的服务的理论武器，这个目的就是为了

保证人类获得一种美好的更幸福的生活而进行斗争。青年的馬克思早已了解到这点，所以他說革命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相联系这个原則的意义也就在此。这也就使得幸福理論在馬克思主义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形成：它不是关于幸福观和幸福的构成問題的一种抽象的思考，而是一种改造社会关系的革命思想，其方法就是为人类幸福創造最有利的条件，同时消除那些妨碍这种幸福生活的实现的社会障碍。

根据我們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区别性說来，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从反面来研究个人幸福問題的，这就是說，它研究的是揭露那些对幸福生活的障碍，并且决定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我們在前面已经說过，只有这种研究方法才能保证得到最好的积极結果，因为这些結果是实在的。

纵观世界，許多人挨着飢餓，过着貧困的生活。人类的三分之二还是生計艰难，缺衣乏食。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他們正确地指出了：社会改革可以医治这种事态，并創造一种美好的、合乎人道的的生活。这不是一种說教，也不是那些大腹便便的人所宣传的道德命令，这些人认为对于挨餓的人只要說几句漂亮話就可頂面包；这样一来，那些挨餓的人不但不想来分享他們的面包，甚至也不想来分享他們的肉类和奶油蛋糕。如果那些飢餓、貧困和痛苦的人們，竟被馬克思主义理論所吸引，并决心信奉馬克思的一个朋友海涅在《冬天的童話》里如此动人地歌頌着的那个理想的話，那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海涅的詩里写道：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让我替你們制作——